

中晚唐文人对藩镇的态度

郭亚男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安史之乱后,强藩割据成为中晚唐最大的痼疾,而中晚唐的文人对于藩镇问题却态度不一,这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而在科举过程中的不同际遇是造成中晚唐文人对藩镇态度分野的重要原因。科举是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但每年科举之后文人就会被分为及第与落第两个群体,以此而入朝为官的必然会支持朝廷,而屡考不中的难免会失望,心生怨恨,敌视朝廷,这也就造就了文人对藩镇的不同态度。探讨文人对藩镇的态度有利于更细致、更深入地了解唐代的藩镇问题。

关键词:文人;藩镇;科举;入仕;幕府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2-0058-06

藩镇问题是安史之乱后贯穿整个中晚唐的主要问题,从安禄山到黄巢起义,藩镇问题无不影响着每一位皇帝的决策及政策。虽然玄宗以后的皇帝也都曾试图解决这一历史问题,如肃宗、代宗、德宗等,但都未见成效。直至宪宗上台后,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平藩战争,国家基本实现统一,但宪宗后藩镇又反叛,最终导致唐亡。

学界关于唐朝藩镇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大都集中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从文人角度来分析的只是星星点点,并未有人从当朝文人角度入手,分析文人对藩镇的态度问题。为此,本文以中晚唐文人这一群体为研究视角,从他们科举之后结果的不同,分析他们对藩镇的不同态度。由于中晚唐时期的文人大都处于社会中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众对藩镇的态度,所以通过从文人的角度分析藩镇问题,区别于以往对藩镇的认识,有利于加深对藩镇的了解。

一、中晚唐文人对藩镇的立场

安史之乱后,强藩割据成为唐中央的最大痼疾。据《新书唐·方镇表》的记载,唐藩镇共42个,其中势力最大的当属河朔三镇:成德、魏博、卢龙。这些藩镇“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1]3896},他们虽然表面上承认唐中央,但有的几十年不沾王化,不仅在经济上独立,兼并土地,私自扩大自己的领地,形成“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2]1329}的局面,“重加税率”^{[1]3838};而且拥有自己的牙兵,军队

收稿日期:2016-02-28

作者简介:郭亚男(1992-),女,山西阳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

完全私人化,强迫人民应征,致使“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2]1330},严重威胁唐中央的统治。

面对这种既已形成的分裂割据局面,文人对藩镇出现了不同的态度。由于文人自身家庭环境、人生阅历不同及中央的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他们在对待藩镇问题上表现出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藩镇割据,支持中央平藩

自幼熟读诗书,严格恪守儒家道德的这些文人,他们在面对强藩割据、国家分裂的现实面前选择支持中央,坚决平藩。他们深知民间疾苦,感慨国家不能统一,而其作为文人,不能金戈铁马,完成统一。因此,这些文人或者写诗揭露藩镇割据的罪恶,赞扬平藩胜利,增强朝廷及军队平定藩镇胜利的信心;或者发表政论性的文章或上书陈述自己对平定藩镇的策略,这些便是他们支持朝廷的主要体现。

1. 揭露藩镇割据罪恶

藩镇“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2]1328},几十年不沾王化,朝廷政令所不及,他们“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2]1329}。正如唐代诗人李贺在《猛虎行》中说:“举头为城,掉尾为旌。东海黄公,愁见夜行……泰山之下,妇人哭声。官家有程,吏不敢听。”^{[3]4425}他将强藩比作老虎,指责他们飞扬跋扈,致使民不聊生,但也讽刺了唐中央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征讨。他还在《公无出门》中以“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3]4429}指出百姓随时都有可能被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中晚唐文人在其作品中大量揭露了藩镇的罪恶,体现出他们支持中央平藩的坚决态度。刘禹锡的《讯氓》深刻揭露藩镇割据罪恶,谴责藩镇残暴,迫害百姓。孟郊的此类诗歌更是不胜枚举,如《感怀》中写到:“豺狼日已多,草木日已霜……路傍谁家子,白首离故乡。含酸望松柏,仰面诉苍穹。”^{[3]4193}《寒地百姓吟》中云:“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冷箭何处来,棘针风骚劳。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3]4200}这些诗所描绘的场面令人触目惊心,体现百姓痛苦不堪的生活。其《乱离》《伤春》《汴州离乱后》等诗作更是描写了百姓痛恨疾苦,控诉藩镇割据、叛乱给人民带来的罪恶。白居易在元和十年被贬江州时所作的《放旅雁》中写道:“官军贼军相守老,食尽兵穷将及汝。健儿饥饿射汝吃,拔汝翅翎为箭羽。”^{[4]232}其中“食尽兵穷”“健儿饥饿”等反映了他反对割据、揭露割据致使民不聊生,而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淮西有贼讨未平”^{[4]232},从这可以看出白居易对中央平藩的坚决支持。

2. 为平藩出谋划策

为平藩出谋划策是中晚唐文人对中央平藩最有力的支持,而在唐中央与藩镇不断斗争的历程中,唯有宪宗元和年间对藩镇的征讨最有成效。宪宗即位初,励精图治,完成统一,因此,围绕在宪宗身边为其出谋划策的文人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有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

白居易在任谏官期间多次进谏,元和五年(810),朝廷平定王承宗时,白居易就上言分析当时形势,阻止宦官吐突承璀带兵出征;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写《答箭镞》:

矢人职司忧,为箭恐不精。精在利其镞,错磨锋镞成。插以青竹竿,羽之赤雁翎……何不向西射,西天有狼星。何不向东射,东海有长鲸。不然学仁贵,三矢平虏庭。不然学仲连,一发下燕城。胡为射小盗,此用无乃轻。徒沾一点血,虚污箭头腥。^{[4]46}

他认为必须“磨锋镞、精箭镞”,对藩镇要坚决使用武力,要学习薛仁贵、鲁仲连,用武力讨伐藩镇。

元和十年韩愈陈述取淮西之状,十一年(816)进献《论淮西事宜状》云:“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阳疾病……况以三小州残弊困据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也。”系统论述了淮西的现状,陈述淮西之地可取的原因;清楚地分析淮西用兵策略,提出“必胜之师,必在速战”,还“要先决于心,详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图功”。统帅者“尽力行之于前”,参谋者“尽心奉之于后”,只有这样才“内外相应,其功乃成”;必须注重后勤给养,对士兵要赏罚分明,提出“兵之胜负,实在赏罚。赏厚可令廉士动心”;又提出“淄青、恒冀两道,与蔡州气类略同”^{[5]471},认为要讨伐吴元济,必须破坏他们之间的联合,集中优

势兵力消灭淮西。河南尹张正甫到河南不久,韩愈作《送张侍郎》云:“司徒东镇驰书谒,丞相西来走马迎。两府元臣今转密,一方逋寇不难平。”^{[5]159}其中“两府”即指裴度、韩宏,指出只要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发挥各自的作用,就一定能胜利。

刘禹锡在《武夫词》中云:“武夫何洗洗,衣紫袭绛裳。借问胡为尔,列校在鹰场。”刻画了军队中武夫骄奢淫逸、作恶多端的形象;“昔为编户人……犹思风尘起,无种取侯王”^{[6]261-262},他认为要消除这种现象,必须赏罚分明,申明约束,使这些武夫为中央所用,把这些嚣张的藩镇纳入国家统治中,虽然这种方法不一定有效,但从这可以看出刘禹锡一直关心藩镇问题,向宪宗进谏,积极为平藩出谋划策。《贺收蔡州表》中“既擒凶逆,遂正刑书……楚氛改色,淮水安流”^{[6]167}指出只有用武力平定藩镇,才能安邦兴国。另外,在他的《平蔡州三首》《城西行》《平齐行两首》等诗中也表明对待已经叛乱的藩镇必须采取强硬手段。

3. 赞扬平藩成功

中晚唐文人对平藩的支持还体现在对平藩成功的赞扬上。元和十二年(817)十一月底淮西战事取得胜利,在此期间唐中央也对成德、魏博进行了征讨,中央陷入两线作战,几胜几负,直至裴度上任挂帅,大将李愬奇袭蔡州,活捉吴元济。这次胜利无论是对朝廷还是藩镇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震撼,清代王夫之也认为这是“自肃、代以来,河北割据跋扈之风,消尽无余,唐于斯时,可谓旷世澄清之会矣”^{[7]753}。文人对此次平藩的胜利都大加赞赏,或从正面,或从侧面描写战争场面,歌颂平藩成功,为后来平藩取得胜利增加了信心。

元和十二年韩愈以行军司马的身份随裴度出征,一路上作了许多诗,如《赠刑部马侍郎》:“红旗照海压南荒,征人中台作侍郎。暂从相公平小寇,便归天阙致时康。”^{[5]159}韩愈通过对刑部侍郎马总的称赞,表达了自己即将随裴度出征的激动心情,以及对胜利的美好憧憬。《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几山下作》云:“敢请相公平贼后,暂携诸吏上峥嵘。”^{[5]159}亦是对平藩胜利的向往。后又劝说宣武节度使与裴度协同作战“请先乘遽至汴,感说都统,师乘遂和,卒擒元济”^{[8]7040},最终取得了淮西大捷。

李愬大雪夜袭蔡州,出其不意,对士兵秘而不宣,“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9]7741}。在这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李愬活捉吴元济,取得淮西大捷。王建作《赠李愬仆射二首》云:“和雪翻营一夜行,神旗冻定马无声,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先锋已上城。”^{[3]3435}从正面描写战场,赞扬平藩胜利,另外还有《赠李愬仆射》。除王建外,刘禹锡、柳宗元也都极力赞扬平藩的胜利,刘禹锡作《平蔡州三首》,向朝廷上《贺收蔡州表》,后又向裴度上《贺门下裴相公启》《上门下裴相公启》,称赞裴度为“一德交畅,万邦和平”,“文武丕绩,冠于古今”^{[6]219}。

元和十四年(819),淄青在朝廷内外夹击下终被收复,至此飞扬跋扈的藩镇终于被平定,国家基本实现统一,刘禹锡上《贺平淄青表》云:“五纪巢穴,一朝荡夷。遂使齐、鲁之乡,复归仁寿之域。”^{[6]170}这一时期王建、鲍溶、姚合等在其诗中盛赞唐中央和平藩的将领,表明了他们对朝廷平藩坚决支持的态度。

此外,裴度、武元衡等也多次上书进谏陈述割据利害,分析局势,提出平藩措施。元和初期,宪宗欲讨伐蔡州,“以度视行营诸军,还,奏攻取策”^{[2]5210}。此后多次征讨吴元济无果,大臣们纷纷要求罢兵,但裴度却上奏“病在腹心,不时去,且为大患。不然,两河亦将视此为逆顺”^{[2]5211}。他分析利弊,提出必须对吴元济继续使用武力讨伐,直至其归附中央。

(二) 依附藩镇、支持藩镇

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他们希望通过科举来实现其经邦济世或富贵显达的人生目标。但唐朝中后期,文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少之又少,而这些文人也并不甘心一生布衣,于是幕府便为这一时期的文人提供了另一个选择。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以诗赋举进士至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10]25}“守官”和“铨选”制度不能如期进行也成为文人入幕

的一个直接原因。另外，安史之乱后，大部分藩镇的职责在于区域治理而非防御外患，首席长官也多为文人而非军人，因此他们更希望征辟幕僚，为自己出谋划策。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文人与幕府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文人依靠幕府解决生计问题或者由此进入仕途，而幕府也需要文人的才华来帮助自己实现区域治理，因此这些文人不再支持唐政府，转而投向幕府，支持藩镇，为幕府服务。

1. 为府主建言献策

文人要实现对藩镇的支持，就必须为藩镇作出贡献，进入幕府。关于入幕最具代表性的界定为：首先在时间上，必须是长期滞留于幕府并且终于幕府；其次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服务幕府而入朝为官，所以他们对幕府的依赖性加强，对唐中央则相对淡漠甚至产生敌视的心态。

中晚唐时期文人入幕几乎成为一种风气，入幕的人数和规模逐渐扩大。比如刘禹锡，贞元九年(793)进士，“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1]420}；许孟容，进士及第之后于赵赞的幕中任判官一职；孔巢父，“建中初，泾原节度留后孟皞表巢父试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行军司马”^{[1]405}。这些文人在唐后期大都有入幕的经历，他们在佐幕期间也大都担任行军司马、掌书记、判官、推官、参谋等文职，通过为府主起草一些管理和治理幕府的文章来表明自己对藩镇的支持。

他们在幕中有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仅起草文章，有的还担任使臣，许孟容便是其中之一，他进士及第之后便在赵赞幕中任判官，后又被“徐州节度使张建封辟为从事”^{[1]410}；贞元初年，“李纳屯兵境上，扬言入寇。建封遣将吏数辈告谕，不听。于是遣孟容单车诣纳，为陈逆顺祸福之计，纳即日发使追兵，因请修好”^{[1]410}。杜黄裳，元和初年的宰相，先是进士及第，后又中宏辞，入郭子仪幕，郭子仪入朝后，杜黄裳担任主留事，“李怀光与监军阴谋矫诏诛大将等，以动众心，欲代子仪。黄裳得诏，判其非，以质怀光，怀光流汗服罪”^{[2]5145}。这些入幕的文人为府主建言献策，挺身而出，担任使臣，尽心尽力为府主服务，深得府主礼遇。

除此之外，他们有的甚至随从参战，进而受到府主赏识，进入幕府为官，得到府主的重用。许多人甚至有参与藩帅机密的权利，像许孟容、杜黄裳等都是辅佐幕府的得力助手，在处理藩镇日常事务及藩镇军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赞扬府主的功绩和礼贤行为

这些文人进入幕府后，在处理藩镇的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还有很多文人因为落第或生计等问题而想要进入幕府，寻求政治目的或栖身之地，为府主服务。因此这类文人大都对府主进行称颂，赞美其功绩和礼贤行为，如鲍溶、张祜、欧阳詹等在这方面都有大量作品。

卢纶在《九日奉陪侍中宴白楼》中云：“玉筵秋令节，金钺汉元勋。”^{[3]3168}在《春日喜雨奉和马侍中宴白楼》中云：“艳艳风光呈瑞岁，泠泠歌颂振雕盘。”^{[3]3168}这些诗句就是对其府主平叛功绩的赞美，并向府主表示敬意及谢意。鲍溶作《述德上太原严尚书绶》：“帝命河岳神，降灵翼轩辕。天王委管钥，开闭秦北门。”^{[3]5510}赞美了严绶受中央所托担任保卫北门的重任，并使之出现了一片繁荣和平的景象。张祜的“一镜辞西阙，双旌镇北都”^{[1]213}“位压中华险，功排上将荣”^{[1]212}等陈述了河东府战略位置的重要，赞美了府主的丰功伟绩。欧阳詹的《咏德上太原李尚书》也表达了其对府主功绩的赞美。

中晚唐时期的府主许多都由文人担任，其中不乏有爱好文学之主，他们招募文人在其身边，不单单是辅佐其治理藩府，还可在闲暇之余陪其作诗唱和。而围绕在其身边的文人就在这时，大显身手，对府主进行盛赞。随行的节度使判官、掌书记均有赞美其府主的诗留传后世。如元和十一年(816)的河东节度使张弘靖作“归田竟何因，为郡岂所宜”^{[3]431}，表明自己希望归隐而不能的心情，随行之人便据其喜好附诗。如韩察的《和张相公太原山亭怀古诗》中“为山想岩穴，引水听潺湲”^{[3]431}就是附和其府主的代表作。这些文人对自己的府主投其所好，赞美府主爱惜人才，礼贤下士。另外还有卢纶的《春日喜雨奉和侍中宴白楼》、张祜的《投太原李司空》等都是对其府主的赞美和谢意。

中晚唐文人对藩镇态度除以上的支持平藩与反对平藩外,还有对藩镇态度摇摆不定的中间力量,他们或前期支持中央平定藩镇,完成国家统一;或后期依附藩镇幕府,为藩镇服务。如姚合、王建等。然而,中央政策和国家制度的不断变化、文人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和际遇的不断变化等不稳定因素,也使文人的态度不断发生着转变。

二、中晚唐文人对藩镇态度不一的原因

文人的家庭出身、人生阅历等都是造成中晚唐文人对藩镇态度不同的原因,但科举却是影响文人对藩镇态度的主要原因。

科举入仕是古代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他们不仅希望在文学方面有所造诣,更希望科举及第,入朝为官。但每年科举及第之人相对于参加科举的人只是凤毛麟角,这就使文人分为及第与落第两个阶层,及第之人感谢朝廷及大臣的赏识,从此竭尽全力为朝廷服务;而落第之人,有的多次科考不中,难免对朝廷产生怨恨甚至报复心理,这也就造成了他们对藩镇产生不同的态度。

因科举而踏上仕途的文人,对朝廷满怀感恩和知遇之情,因此必然会支持朝廷对藩镇用兵。如韩愈四次参加科举终中进士,后被宣武节度使董进任用为观察推官,踏上了仕途,但后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2]5255},后又担任四门学士、监察御史、行军司马,“元济平,迁刑部侍郎”^{[2]5258},最后被贬。纵观韩愈的政治生涯可知,他一生都在朝廷为官,支持朝廷的大政方针,为朝廷服务。白居易,贞元年间进士及第,因科举而踏上仕途,实现政治理想,因此白居易在任职期间竭尽所能地为朝廷服务,不断上书陈述藩镇割据的危害,积极为平藩建言献策。如阻止宦官吐突承璀带兵讨伐王承宗时,白居易分析利害,上奏:“若又迟疑,其害有四:可为痛惜者二,可为深忧者二。”^{[9]7672}

中晚唐时期朝廷多次举行制举策问,这也为许多文人进入仕途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的途径,而这些文人无不是揣摩着朝廷的政策方向而进行试策的,从这个角度讲,这些文人是支持朝廷决策、迎合朝廷政策的。放到以平藩为重心的中晚唐,就是为平藩出谋划策。如顺宗年间的制举策问,就是关于藩镇问题的,杜元颖的对策颇得顺宗赞赏。元和年间,宪宗平定西川刘辟叛乱后,便以藩镇问题策问,韦惇深受之前平定西川胜利的影响,其对策极力主张用武力来解决平藩问题,正好符合当朝宰相杜黄裳武力平藩的观点,更迎合了宪宗平藩的意图,因此宪宗深信不疑,韦惇正因此而制举及第。从这方面来分析,这些文人想要通过制举及第,就必须遵循朝廷的意图,揣摩皇帝及大臣的心思,也就是说,在以平藩为重心的中晚唐,文人要想及第,就必须支持朝廷平藩。

科举之后还存在大量的落榜之人,这些文人并非会马上怨恨朝廷,因为来年还可以继续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对于那些七八年甚至十几年未中第的文人而言,难免会对科举失望,会对朝廷产生怨恨甚至敌视,而其急于入仕的心理促使他们选择了幕府。如“(唐彦谦)十余年不第……王重荣镇河中,辟为从事。累奏至河中节度副使”^{[1]5063}。落第文人要想留在幕府,必须得有才华,或者为幕府提出可实施的策略,得到府主的赏识,然后才可为府主服务。因此这些落第文人必须首先支持幕府,才有可能进入幕府。

这些落第文人大多是柔弱书生,因为科举而长期滞留长安,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更有许多文人居无定所,没有生活来源,因而不得不选择栖居幕府。幕府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栖身之处,还能解决其生活问题。与朝廷相比,他们更加感激府主的收留和赏识,并会忠诚于幕府,全心全意为幕府服务。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晚唐的文人与藩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安史之乱后,藩镇愈发嚣张跋扈,与中央形成对抗之势,在此期间中央与藩镇之间既有妥协又有对抗,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而当朝文人关于藩镇问题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唐代实行科举考试,科举是当时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人人都希望科举及第,入朝为官。

但每年科举及第之人相对于参加科举的人来说,只是凤毛麟角,这就使文人分为及第与落第两个阶层。及第之人感谢朝廷及大臣的赏识,从此竭尽全力为朝廷服务,在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的现实面前选择支持中央,坚决平藩;而落第之人,有的多次科考不中,难免对朝廷产生怨恨甚至报复心理,选择进入幕府,支持藩镇,为幕府服务。这也就造成了他们对藩镇的不同态度。

参考文献:

- [1]刘 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欧阳修,宋 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曹 寅.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4]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5]韩 愈.韩昌黎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
- [6]刘禹锡.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7]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8]董 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1]全唐诗补编[M].陈尚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The Analysis of Literati's Attitude Toward Military Governorship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Guo Yan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An-shi Rebellion, strong Fan is the most severe problem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Literati have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 butter region, which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reasons,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an important reason.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the main way of literati being officials. However, after exam every year, scholars may pass or fail the exam. And those who become officials will support the government, but others who failed repeatedly must be disappointed or hostile to the court, which produced different attitude to military governorship. The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is conduciv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of buffer region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 literati; military governorship; imperial examination; to be official; buffer region

(责任编辑 张春生)